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二辑

侠义小说史话

曹亦冰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二辑

侠义小说史话

曹亦冰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建平县书刊印刷厂 印刷

字数: 80,000 开本: 787×1092¹/32 印张: 5

印数: 1—10,619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 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 孙明晶 马 慧

ISBN 7-5382-1704-5 / 1 · 87

定 价: 2.50 元

内容简介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心，把本来是惊心动魄的侠义小说，作了娓娓动人的讲述——从先秦探源，由史传文学到唐宋传奇，条分缕析，直至晚清新武侠小说，在演述侠义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探讨侠义小说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以及广大读者的社会心态；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不仅评介了侠义小说作品，也探讨了其发展的规律。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 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 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

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阔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一	侠义小说的起源	(1)
二	侠义小说的萌芽	(4)
三	侠义小说的生长	(10)
四	侠义小说的形成	(22)
五	侠义小说的成熟	(47)
六	侠义小说的发展	(63)
七	侠义小说的繁荣	(102)

一 侠义小说 的起源

侠义小说起源于先秦两汉。战国末期哲学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侠”，即侠客义士，指那些“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人（《史记·游侠列传》）。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批的侠客义士，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暴力统治的气焰，声援了正义。推究侠客义士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大分裂、大变革、大动荡的社会中，强国争霸，弱国争存，群雄逐鹿，都想通过各种势力和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这种社会现实是侠客义士产生的土壤。

第二，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

士的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很复杂，有没落的贵族，也有新兴的地主，还有脱离生产的自耕农。他们的地位较低，处于统治阶级的下层。他们中间既有通晓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有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而且还有“以武犯禁”的侠客义士。学术上约分为十家：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和小说家。一般统称为“诸子百家”。他们的作用，是为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提出符合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根据。因而，诸侯卿相争相养士。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这种养士之风为侠客义士提供了生存的条件。

第三，崇武尚侠的社会风气是侠客义士存在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不断，国与国之间，争雄争霸，相互吞食；国家内部，君与臣之间和臣与臣之间，争权夺势，互相残杀。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而国君和大臣争“养游侠私剑之属”，“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民之所誉，上之所礼”。因为侠客的行为是扶弱抗强，向善反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战争的继续和补充。如《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记载的刺客曹沫

的行为就是如此。曹沫是鲁国人，因为他有“勇力”被鲁庄公用为大将。他率军与齐国交战，三次都打了败仗，鲁君惧怕齐国，只好将“遂邑之地”献给齐国，以便讲和，但仍然用曹沫为大将。当齐桓公与鲁庄公在齐国柯邑举行和好的盟誓时，“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并责问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在他这突如其来英勇之举下，齐桓公身边的武将，没有一个人敢动作的，而这位大国之君、五霸之首齐桓公只好老老实实地答应归还鲁国的失地。从此，侠士刺客的地位大大地得到了提高，他们成了弱者反抗强暴的精神支柱。侠客义士随着人们的敬仰层出不穷。司马迁为了倡扬他们的功德，在他精心撰写的巨著《史记》中，树碑立传，使他们的侠义精神永垂青史，并为侠义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素材，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把《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看作是侠义小说的源头。

二 侠义小说 的萌芽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燕丹子》是中国侠义小说的第一个胚胎。因为第一，文体上它是属于小说的范畴，它虽然所叙之事，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之事大体相同，但在艺术上却有明显的差别。首先叙述手法上，《史记》采用人物传记的写法，文章一开头，介绍刺客荆轲的姓名、籍贯、生性爱好以及活动简况；而《燕丹子》则是采用小说的手法，故事一开头就开门见山，抛出矛盾的焦点，拉开燕太子丹与秦王政欺侮与反欺侮斗争的序幕。其次，故事情节增加十数处。如：燕太子丹质秦归燕的事，《史记》只是一笔写过：“秦之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燕丹子》一书在此增强了三个情节：一个是燕太子丹求归受到秦王的无理阻挠：“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今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

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另一个情节是秦王故意设卡，进一步阻挠燕太子：秦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再一个是客观上的障碍：“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又如：荆轲在田光先生的举荐下去见燕丹子，《燕丹子》较之《史记》增加了两个情节：一个是“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另一个是燕太子丹“置酒请轲”，酒席宴上“太子起为寿”，燕国卿士夏扶以“乡曲之誉”为题激诘荆轲。荆轲一通宏论，使在场的人都称赞佩服。这个情节酷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这种写法对荆轲人物的塑造起到了着色升华的作用。再如：燕太子丹厚遇荆轲之事，《史记》里只是笼统地写：“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燕丹子》则是增加了用金投龟、“杀马进肝”、断美人之手以玉盘奉等几个情节，大大加强了其故事性和趣味性，这也正是小说创作的特点。还如最后一节“图穷匕首见”，荆轲与秦王展开搏斗的事情，两书写法也截然不同。《史记》是这样写的：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竖，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

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

我们再看看《燕丹子》的叙述：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为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

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擿之，决秦王，刃入铜柱，火出。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

以上两种写法各本其体。《史记》采用的现场记实手法，符合纪传体例。而《燕丹子》则采用文学创作方法，按照作者的主观愿望去安排情节。无论《战国策》的记载，还是《史记》的记载，荆轲都没能劫持住秦王，皆写秦王“袖绝”而脱身，后在大臣们的提醒下，才拔出宝剑杀死荆轲。《燕丹子》的作者却让荆轲劫持住了秦王，并加以责数，大有如愿以偿的味道。但是文学创作，既要高于生活，又要源于生活。作者没有忘记，荆轲失败，这是史实，所以作者凭空添了个听琴的情节。这个情节很重要，一方面使故事的结尾回到史实上来，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了秦王政的狡猾性格和荆轲的诚实性格。再次，增加浪漫色彩和具体描写成分。如：“乌即白头，马生角”。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出现的，但是作者却把它当作理想写进作品之中，帮助燕太子丹冲破秦王政的无理阻挠，回归燕国。这是浪漫色彩的描写。具体地描写，如：秦王接见燕使的场面，《史记》写：“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极为简略而平

淡。《燕丹子》则写：“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数百，见燕使者。……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这样的描写大大地烘托了气氛，既呈现出了秦王朝的威严虎气，又反映出了接待宾客的隆重场景，为塑造荆轲和秦武阳的形象起到了一种铺垫的作用。当荆轲捧於期首级，武阳捧地图步入咸阳宫时，《史记》和《燕丹子》都写了秦武阳的神态。《史记》写“秦武阳色变振恐”。而《燕丹子》则写“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这种形象而具体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展示出秦武阳心惊胆颤的丑态。又次，调整了事情的前后顺序，改变了人物对话的内容，使其适合小说的创作特点。如《史记》写燕太子丹见到荆轲后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并提出以武力胁迫秦王的计划。然后笼统地写了燕太子厚遇荆轲的话。而《燕丹子》则不然，写燕太子见到荆轲后，先设酒宴接风洗尘祝寿，再具体描写燕太子丹对荆轲的厚遇，然后写荆轲深为感动，决心为太子“当犬马之用”，接着为燕太子丹分析了秦燕两国的强弱形势，认为“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最后提出劫持行刺的计划。这种写法不仅使作品的文学色彩加浓了，而且也揭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因，更加符合侠客义士的性格特征。总之《燕丹子》“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当是古今小说杂

传之祖”。《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了此书，《四库全书》亦将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列入小说类存目。

第二，题材上，是写侠客义士扶弱反暴，“以武犯禁”行侠仗义的事情。作品的主旨是在“揄扬侠勇，赞美粗豪”，这与后来的侠义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侠义小说的第一部作品。然而由于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构思布局、剪裁及创作方法等方面还很欠缺，所以它只能算作侠义小说雏形。

《燕丹子》何人所作，成书于何时呢？《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卷，题燕太子丹撰。多数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是望文生义”。它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的著录，只著卷数（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所以迄今还没有个权威意见，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至于成书年代，亦众说纷纭。一种认为是“先秦古籍”，以清代学者孙星衍为代表。鲁迅先生也认为此书汉前之作。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汉人小说”，以明代学者胡应麟为代表。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以近代学者罗根泽为代表。

三 侠义小说 的生长

侠义小说的生长，是个漫长的时期，它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八十年的社会历程。这个时期的社会特点：

(一) 以豪门世族大地主为主体的统治阶级极端反动、腐朽。他们把官僚地主的经济特权制度化，士族可以依据官品合法地占有大量的土地；同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其成为保障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日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特权阶层。他们为了保证士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垄断，还确立了反动的门阀制度。因而出现了“百家谱”、望族、大姓和占田万顷的大庄园主。统治阶级倚仗特权，欺压百姓，荒淫腐朽，贪婪暴虐。

(二) “清议”之风的盛行。自东汉后期，在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这种作法被称作“清议”。它的作用，能在很大程度上左

右乡闾舆论，影响士大夫的仕途进退。在“清议”的风行下，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极力把自己伪装为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议者赞扬。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的名士。大官僚和门阀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对于这种清议也大肆提倡。

(三) 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佛教在西汉末年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内地，其后，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佛道二教首先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因为他们一方面可以凭此麻痹人民，另一方面妄想成仙得道，永享福乐。劳动人民在残酷的压榨中，轻信佛经上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谎言，同时笃信道经上的“散财救穷”、“祈福禳灾”等话语，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因而，信佛奉道成了时髦之风。据有关史料记载，北魏末年，全国寺院内激增至三万余所，洛阳一千三百多所。梁武帝时建康僧尼达十余万人，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对此统治者只好限制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后又改为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限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出家。一些文人学士由于政治上遭受残酷迫害，思想上陷于颓废，亦于佛道中求安慰解脱。佛经中的一些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可见佛道之昌盛。